

李白詩選

544



李 白 詩 選

舒 蕪 選 註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北 京

書號 284

字數 100000

李 白 詩 選

選註者 舒 蕪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 00001—35000

定價 5.30元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前言

李白，字太白，生於唐武后長安元年（公元七〇一年），卒於唐肅宗寶應元年（公元七六二年）。

關於李白的先世和籍貫，歷來有幾種不同的說法，現在還是一個需待研究的問題。但這裏不妨說，蜀中（今四川省）乃是李白的實際上的故鄉。

李白五歲左右的時候，他的父親攜同全家從別處移居到綿州彰明縣青蓮鄉（在今四川綿陽縣北六十餘里）。他從此就在蜀中生長，直到二十五歲左右。後來他在四方浪遊當中，始終是用着懷念故鄉的感情，來懷念蜀中的山水風物，寫了不少動人的詩篇。

李白的一生，絕大部分是在浪遊四方當中度過的。他少年時候，遊覽過蜀中的許多地方。出蜀以後，大約二十五歲到三十七八歲的十多年間，他主要是往來在安陸、襄

陽、江陵（今均屬湖北省）一帶；中間也曾遊過洞庭湖，到過金陵（今江蘇南京）、廣陵（今江蘇揚州）等處。三十七八歲以後，他到過太原；又在任城（今山東濟寧縣）住了幾年，並在那裏安了家。四十二歲的時候，他在會稽（今浙江紹興縣）、剡縣（今浙江嵊縣）一帶；因吳筠的推薦，被召至京城長安（今陝西西安）。他在長安，一度頗得當時的皇帝唐玄宗的賞識，供奉翰林，掌管機密詔命的起草。但是，他的浪漫的性格和正義的主張，終於使他遭受到權臣貴族們的排擠。他在長安僅僅三年，四十四歲的時候，就被變相地放逐出京。他在那以後大約十年當中，所到的地方很多，東南西北，往來不定；除了常回任城家中看看而外，經過次數較多，逗留時間較久的，是梁、宋一帶地方（今河南省）。大約五十四歲到五十五歲的兩年間，他經常往來於金陵、廣陵、宣城（今屬安徽省）等處。五十六歲的時候，他在廬山，被當時鎮守南方的永王李璘召爲王府幕僚。就在那一年，永王李璘起兵，與他的哥哥李亨（唐肅宗）爭奪帝位。次年，永王兵敗，李白因此被逮捕，囚在潯陽（今江西九江）。後來雖經別人營救出獄，但仍被判罪，永遠流放到夜郎（今貴州桐梓縣）。他五十八歲的時候，開始走上被流放的長途；次年，在途中遇着大赦，才得回來。此後，他仍然往來在金陵、宣城等處。六十二

歲的時候，他作客於當塗（今屬安徽省）縣令李陽冰處，在那裏逝世。

李白的性格是非常浪漫和豪放的。他的感情是熾烈的。他熱愛祖國，熱心於政治。他按照我國古代士大夫的老一套的方式從事政治活動：設法在當時各級的封建統治者面前，表現自己的才能，宣傳自己的主張，希望得到他們的賞識和信任，給自己以政治地位，給自己以實現政治理想的機會。但他的豪放的性格，熾烈的感情，是建築在對於正義和自由的迫切要求上面的。而這是和當時統治集團有矛盾的。就是說，在當時只有用犧牲正義和自由作為代價，李白的政治活動才能夠成功；但李白不肯付出這樣的代價。他在長安供奉翰林的時候，本來和當時權勢炙手可熱的楊貴妃、高力士之流很有機會接近，但他對他們不但沒有奉承拉攏，反而毫不掩飾地予以鄙視，終於遭受他們的排擠。這就是一個例子。所以，他對於政治儘管熱心，一生中真正的政治生活，却只有短短的兩次，時間共總不過五年，並且都以失敗告終。他在當時，已經享有極大的詩名，但仍然是在四方浪遊當中過了一生，終於在飄泊依人的情況中死去。

李白也有庸俗的一面：他在詩文中往往坦白地表示了對『功名富貴』的羨慕；對於長安三年中『章臺走馬』、『眠花醉柳』的生活，當時頗有些得意忘形，後來提起來也

還是戀戀不忘。但是，事實證明，他終於沒有犧牲正義和自由，去換取他那樣羨慕着的『功名富貴』。

李白也有消極的一面：他熱心於學道求仙。他的一部分作品中往往宣傳着一些『浮生若夢』、『人世無常』之類的思想。但是，在他的學道求仙的動機當中，實在有相當大的成分是借此反抗當時權貴們的威勢的壓抑，幻想從這裏得到自由和解脫的。他所歌詠的神仙世界，有不少就是對於自由、幸福的生活的幻想的結晶。至於他的詩文中那些『浮生若夢』之類的思想，從全體來看，畢竟是比較次要的東西；而構成他整個作風的基調的，畢竟是那種光明開闊的心情，『淥水長天』、『花光百里』似的境界，那在本質上就是人民對於生活的健康積極的態度的反映。

李白的性格和思想，和許多古代的偉大的作家和詩人一樣，是非常複雜的，充滿了矛盾的。這些複雜的矛盾，正是他們所生活的時代以及他們在當時的社會地位的複雜的矛盾的反映。但是，進步的、人民性的東西，無論如何總是佔着主要的地位。對於這一點，過去的人民會給以正確的、公正的評價。我國古代通俗小說和民間傳說當中，流傳着不少李白的故事和逸事。在那些故事和逸事當中，李白被描寫成一個非常可愛的、多

才多藝的、爲國爭光的、從生到死都富於詩意的、並且虛心向普通人民學習的人。這些雖不是真實可靠的史料，但却是人民對詩人的熱愛和正確評價的最鮮明的表現。

二

李白是我們民族歷史上偉大的詩人之一。我們民族的古典詩歌史上被稱爲黃金時代的是唐代（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唐代詩壇上，李白和杜甫，成爲同時並峙的兩個最高峯。在世界文學史上，他們也是達到了詩歌藝術最高成就的。

詩人李白，通常被現代人稱爲浪漫主義者。他的浪漫主義的主要部分，是健康積極的。他運用了高度誇張放大的方法，鮮明地反映了當時人民的情感和意志。這種浪漫主義，本質上是和現實主義相通的；它在任何民族的文學史上，都是被概括到整個的現實主義傳統中去的。

現存的李白的詩篇當中，直接反映人民生活、反映社會政治情況的，並不很多；如果和號稱『詩史』的杜甫比較起來，尤其顯得少。但是，人民的崇高優美的心靈，人民對於光明和自由、愛情和幸福的熱望，人民爲爭取美好生活而鬥爭的決心，總之就是人

民的精神面貌，却通過詩人李白自己的同樣性質的感情的抒寫，而得到鮮明無比的反映。它們原是人民羣衆的現實生活中廣泛存在着的東西，被詩人用自己的心靈吸收和集中起來，予以藝術的提高，於是隨着詩篇的廣泛流傳和深切感染，重又灌注進人們的心靈，成爲一種力量，鼓舞人們去爭取美好的生活。這就是李白的詩篇的巨大的積極意義之所在。

李白之所以能够這樣成功地反映出人民的力量，是和他所生活的時代正是我國封建社會中人民力量高漲的時代這一事實分不開的。

大唐帝國的建立，是隋末農民戰爭勝利的結果。隋末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雖然和我國歷史上的一切農民戰爭一樣，沒有也不可能使農民從封建制度之下得到根本解放，因而在根本上也是失敗了的。但是，就具體情狀來看，這一次的農民起義，在其推翻隋朝的封建政權的鬥爭中，是曾經給封建力量中最腐朽的部分以嚴重的打擊的；雖然農民戰爭的勝利的果實依然爲封建階級所奪去，封建的經濟關係基本上沒有改變，但靠農民戰爭興起的唐朝的統治者，是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照顧到農民的要求的。這一次農民戰爭，是與秦末、元末的農民起義同一類型，而與黃巾、黃巢、李自成那些失敗了的起義

有所不同。這是一次勝利的農民戰爭，大唐帝國是在這一勝利基礎上建立的，它結束了漢末以來大約四百年中差不多一貫下來的分裂割據、異族侵入的長期混亂局面。大唐帝國建國之初，就規定了一系列的具有進步性的經濟和財政制度，反映出農民戰爭的勝利所發生的巨大影響，反映出封建的生產關係在農民戰爭勝利的影響之下暫時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與生產力的性質相適合的情況。這些制度，是高漲着的人民力量迫使封建統治者讓步的結果，同時也只有在那些最腐朽的封建力量遭受了嚴重打擊之後的社會經濟情況的基礎上才可能建立起來。其中最主要的是『均田制』，它限制了土地的過分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保障了農民免於失去土地。此外，還有關於減輕賦稅的、救濟災荒的、組織農村勞動力復員的等等制度。這些制度，在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下，都是顯然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的。它們從唐代開國，直到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安祿山之變發生，大體上一貫地被執行着。因此，這一百三十多年當中，全國生產力大體上是一貫地上升，引起全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空前未有的高漲。當時的大唐帝國，乃是世界上頭等強大、文明和富庶的國家之一。

那個時代的後期，約為公元八世紀的前半葉，我國文學史上稱為『盛唐』，產生了

許多優秀的詩人。他們的作品，儘管各有其獨特的風格，但總的來看，都是那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即我國文學史上所謂『盛唐氣象』的反映。過去的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對於所謂『盛唐氣象』，一般都非常推崇，用了許多話，例如『雄渾高華』、『堂皇典麗』之類來形容它；歸根到底，它無非是農民戰爭勝利後的高漲着的人民力量的表現。而在盛唐詩人當中，具有全面的代表性的，表現出最典型的『盛唐氣象』的，就是李白。

李白的詩篇，介紹給我們這樣一個世界，在那裏面：景物的形象，有驚奇絕險的名山大川，有和平淡遠的田園村舍，有窮邊絕塞的蒼茫，有曲澗清溪的幽靜，有風雷怒吼，有花月爭輝，有碧海仙山上高與天齊的『扶桑』『若木』，有沉香亭畔富麗風流的牡丹，有大地極北陰冥冷冽中的身長千里的『燭龍』，有江南山明水秀之鄉的白鷺鷥和錦駝鳥……；活動的形象，有戰爭，有詩酒，有俠客的劍光，有美人的舞袖，有章臺走馬的五陵少年，有山林高臥的幽人隱士，有百戰沙場的老將，有方巾緩步的迂儒，有『爲君談笑靜胡沙』的『東山謝安石』，有『笑隔荷花共人語』的『若耶溪旁採蓮女』，有殺人報仇的勇婦，有秋作夜春的農女，有『虛步躡太清』的仙人，有『爐火動天地』的礦工……。這個世界是這樣豐富多彩，可是無論那一個角落裏，甚至已經說是『日月

之照』所不到的角落裏，都照臨着白日或皓月的光輝，都通到一個廣闊無邊的背景，都貫串着一股長江大河似的奔騰浩蕩的氣勢，更重要的是，都在讀者心中引起一種生氣勃勃、遏止不住的青春奮發的情感。很顯然，詩歌中的這個世界，就是當時現實世界在詩人的天才的心靈中的投影。而人民在一切時代裏面都是唯一的、基本的創造歷史和創造文化的動力，是產生天才的源泉，也就從這裏得到一個極其雄辯性的證明。詩人李白的偉大的意義，正在於此。

至於直接反映當時人民生活 and 社會政治情況的詩篇，在現存的李白的作品當中，雖然數量上所佔的比例較小，但並不是不重要的。對於當時朝政的紊亂，君主的昏庸，權臣貴族的荒淫橫暴，詩人都曾就他所能認識到的，予以揭露和抨擊。特別是安祿山之變，這樣一個當時震撼全國、後來深刻影響到整個歷史發展的大事件，不僅被詩人深切關心，在不少詩篇中得到相當詳盡的反映，而且深深地打動了詩人的愛國主義的政治熱情，使他寫出長篇大論的直接評論時事的政論性的名作。這一部分的詩篇，政治價值和藝術價值本來都相當高；但對於李白這樣一個大詩人來說，究竟還沒有達到足以成爲他的主要代表作的水準。正因此，詩人的這一面就常常容易被人們忽略。也正因此，今天

我們必須很好地認識這一部分的詩，把它擺在應有的地位。

三

對於詩人李白的偉大的意義，還應該從他在中國文學史上所起的偉大作用來認識。中國文學史，從『詩經』開始，整個地來看，一直是貫串了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的。這個人民性和現實主義傳統的發展，始終是以民間文藝的發展爲其主導的因素。一切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和詩人，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向民間文藝學習，從中吸取不可少的營養。凡是代表着整個一個歷史時代的大作家和大詩人，則都是意識或不意識地繼承了某一整個歷史時代的民間文藝的遺產，總結了某一整個歷史時代當中作家和詩人們向民間文藝學習、對民間文藝加工的經驗，在反對反人民性和反現實主義傳統的鬥爭中，以其創造性的勞動成果，結束了這個鬥爭的一個歷史階段，奪取和鞏固了現實主義和人民性傳統的勝利。李白，就是起了這種偉大作用的偉大詩人之一。

前面說過，大唐帝國是在農民戰爭的巨大勝利之後建立起來的。漢末以來大約四百年中，政治、經濟上和文學、藝術上，同樣留下許多特別腐朽的封建性的東西。農民戰

爭的巨大的革命力量，已經掃蕩到政治、經濟的領域，其精神上的影響必然隨着就要掃蕩到文學、藝術的領域。所以，大唐帝國之初，就和政治、經濟上一系列的具有進步性的制度帶來一片新氣象一樣，文學、藝術上也立即出現了新的氣象。文學史上所謂『初唐』的時期（大約即是第七世紀的一百年），詩壇上一方面存在着以齊、梁宮體爲代表的頹廢淫靡、形式主義的詩風的殘餘影響，另一方面却逐漸成長着一種新的健康的東西，竭力要突破腐朽的舊傳統的壓抑和束縛，開出新的道路來。

陳子昂（公元六五六—六九八年）是第一個旗幟鮮明地站到詩壇上來，宣佈這個鬥爭的開始，並實行英勇衝鋒的人。現存的陳子昂的詩篇數量並不多，但其中已經可以顯然看出後來的『盛唐氣象』的萌芽。但是，他對於漢、魏以來樂府民歌的豐富遺產的學習和繼承，顯然是還不够全面和直接，也還欠缺高度創造性的。他的淵源，主要只是過去的幾個詩人。那些詩人也曾或多或少地向樂府民歌學習過來，才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就。他們的經驗是應該總結的，但把他們的作品當作吸取營養的主要源泉，却是不够的。因此，陳子昂的詩篇，一方面固然表現出一種莊嚴剛健的氣象，令人振作；另一方面却欠缺豐滿自然，令人感到乾枯板滯，因而也就不能在反對齊、梁宮體的殘餘影響的

鬥爭中，爲現實主義和人民性的詩風奪取廣闊戰線上的勝利。

陳子昂所沒有做到的，李白做到了。陳子昂成爲李白的先驅；李白結束了由陳子昂開始的鬥爭，奠定了勝利的大局。

李白在詩歌藝術上的崇高成就，和他對於漢、魏以來樂府民歌的豐富遺產的繼承，有着密切的關係。這是我國的批評家和文學史家歷來一致承認的。李白對於漢末以來詩人們學習樂府民歌的經驗，以及他們對樂府民歌進行藝術加工的經驗，也曾作過一些總結。這是我國的批評家和文學史家歷來也都知道，但沒有充分認識其意義的。對於這兩個問題，可以從下面三點來看。

第一，兩漢、三國、南北朝的樂府民歌，經歷了極其豐富的發展過程，留下了多方面的寶貴遺產。李白以前的唐代詩人，也有能够重視這種遺產的，但往往偏於其中的某一個或幾個方面，因此就不可能獲得全面性的巨大成就。到了李白，才能够對這些遺產作全面性的繼承。漢、魏樂府中對社會生活規律的深入的探索，兩晉樂府中對幻想中的美好世界的強烈的追求，南朝樂府中的人民的美麗的愛情，北朝樂府中的英雄氣概和邊塞景色……，『三調雜曲』之類的豪唱狂歌，『清商小樂府』之類的輕吟緩詠，『孔雀

『東南飛』之類的長篇敘事……，這一切，都在李白的詩篇裏面留下了深刻的影響，而又通過詩人的獨特的創作過程，熔煉成一個全新的統一的風格。不但如此，時代更遠一些的『楚辭』的某一部分的傳統，也在李白的詩篇裏面得到積極的發揚，這也是歷來的批評家和文學史家一致承認的。此外，李白也曾有意識地仿作『詩經』式的四言詩，雖然大抵都是不甚成功的作品，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接受遺產上的努力，範圍是這樣廣泛。

第二，李白對於漢、魏以來樂府民歌的遺產的繼承，一方面忠實於民間文藝的優良傳統，另一方面又充分發揮了他的創造性。最突出的例子是他那些直接用樂府古題爲題的詩篇。過去就有批評家指出：同一題目之下，樂府古詞的妙處，往往正因李白的詩詞而更加鮮明；但李白的詩詞，看起來又恰恰只是李白的作品，而不是任何其他詩人的作品。漢、魏以來，詩人擬作的樂府很多，其中達到較高的藝術水準的也不少，但像李白這樣的創造性的充分發揮，却是空前未有的。而文學史的事實也證明，正是需要這樣高度創造性的繼承，而不是相反的方式，才能把樂府民歌的遺產中的優良傳統，真正地發揚光大起來。

第三，三國、六朝的文學史上，除了樂府民歌的光輝的發展而外，也曾出現了一些傑出的詩人，他們都會直接間接地向樂府民歌學習過來，他們的經驗也需要總結，這是前面已經說過的。李白對於他們的態度，是矛盾的。在正式談起詩歌理論的時候，李白對他們曾採取一概抹煞的態度；但在其他場合，對於謝朓、謝靈運、阮籍、曹植等，却多次表示了情不自禁的欽佩和景仰；而且根據杜甫對他的正確的評論，他所受於庾信、鮑照、陰鏗的影響，都相當的深；此外，在描寫農村生活和田園景色方面，在運用口語方面，我們也可以顯然看出陶潛和李白之間的某種關係。這個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在三國、六朝的時候，特別是六朝中的齊、梁兩朝，在樂府民歌的光輝的發展的同時，詩人當中，除了那些特別偉大的和傑出的而外，一般都確實沾染了或多或少的頹廢淫靡、形式主義的風氣。李白對於那種風氣既是抱着強烈的反感，自然就難免在理論上對那些詩人不加分析地一概抹煞。可是，在創作的實踐中，那些詩人所留下的某些較好的經驗，也很自然地要進入李白所注意、所考慮、所總結的範圍之內。

總起來說，李白在我國文學史上所起的偉大的作用，首先就在於他能够全面地、富有創造性地繼承了漢、魏以來樂府民歌的豐富遺產，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總結了這樣悠